

习近平家语

在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给我抹黑的事。我这样说绝不是摆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

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人,决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

《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7月8日)

单亲家庭数量上升,独抚母亲自身与养育困境尤其值得关注

让单亲妈妈群体被更多地“看见”

编者按

近几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我国独抚母亲群体规模日渐庞大。独抚母亲群体面临家庭变故与纠纷、经济、子女抚育、职业发展、社会歧视偏见等多重困境与挑战。

目前,社会各界已更多关注独抚母亲群体,为她们提供专业化的支持服务,给予她们科学的养育辅导,帮助其家庭提升亲子关系,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关爱她们的身心健康,帮助她们自我成长……构建对独抚母亲友好的社会环境值得期待。



“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开展培训活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葵

“成为独抚母亲后,我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非常担心,经常自我怀疑,直到我参加了‘一个母亲’组织的‘百日变身’小组,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也结识了一群单亲妈妈,她们后来成为我社会支持中的一部分,让我更有力量去面对现在的生活。”

在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一个母亲”)近日主办、好公益平台支持的“让独抚不再难——关注独抚母亲的困境和需求”媒体沙龙上,单亲妈妈妙妙分享了自己离异后的心路历程。

群体庞大 困扰多元

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离婚率从1984年的0.39%升至2019年的3.4%,2019年一年全国离婚超过470万对。数据显示,70%以上离异家庭子女由女方抚养。据2018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与需求调研》的保守推算,目前全国包括离异和丧偶在内的独抚母亲超过2000万。

独抚母亲群体数量庞大由此可见一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春泥在沙龙中提到,我国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突出呈现的变化包括离婚水平快速上升、同居行为日益普遍等,离异成为造成目前单亲家庭数量上升的主要原因。

谈到单亲妈妈群体面临的主要困境,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东红表示,单亲妈妈面临的首要难题是经济压力,一部分单亲妈妈无法及时、足额拿到抚养费,或因为婚内债务问题,导致经济压力骤增。一项对271位离异单亲母亲的调查显示,前夫从未支付过抚养费的比例为59.4%,实际支付金额大多低于法院判决的抚养费给付金额。她们要维持基本生活和子女的教育支出,其中很多人还需要独自偿还房贷,为钱焦虑成为常态。妙妙直言:“离异后,我从

之前追求‘归宿与爱’这个层次一下子降到了追求‘物资保障和心理安全’层次。”

王东红说,绝大多数单亲妈妈处在不属于劳动法给予保护的孕期、产期、哺乳期三个特殊时期,她们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不得已选择时间灵活、不出差的工作,这使她们面临职场竞争力下降、就业能力下降、收入增长缓慢带来的压力。

张春泥在研究中也发现,我国单亲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家庭内的代际支持来解决抚育问题。相比单亲父亲,单亲母亲虽依靠祖辈帮助,但她们在母亲上更亲力亲为,不见得比双亲家庭的母亲做得差,这对子女的养育是有好处的,但代价是她们可能会感受到更高的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受到更高水平的家庭对工作的干扰。

在与众多独抚母亲的接触中,“一个母亲”项目总监刘蕾发现,隐蔽、分散、忙碌、羞耻感增强,自我价值感低下是这一群体的共同特点。王东红也认为,单亲妈妈因为社会偏见或与前夫家庭仍有矛盾未化解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人民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硕士沈芮伊结合自己对27名单亲妈妈和单亲子女的深度访谈发现,部分单亲妈妈备受慢性身体疾病或心理危机的困扰。

此外,学校教育对单亲家庭的隐形排斥、非婚单亲妈妈的生育保险不到位以及非婚生孩子的落户难,部分遭遇家暴的妈妈缺乏相应的求助和维权渠道等,也是单亲妈妈面临的挑战。研究表明,部分独抚母亲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容易被负面情绪困扰,有的甚至有自杀倾向。

单亲家庭增多对双系抚育制度提出挑战

相对于双亲家庭,单亲母亲更容易陷入贫困、不稳定和低质量的生活状态。独抚母亲拥有的资源变少,普遍对孩子有亏欠心理,又不知如何教育孩子去弥补单亲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对孩子寄予更多期望,不恰当的养育方式和对孩子的过高期望使亲子关系变得紧张;这些都会引发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障碍,并对学业产生负面影响。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江苏省妇联兼职课题组长崔效辉博士以南京市近年调研数据为例,说明单亲家庭职业角色单一、互动单调,两个人之间互动频率增加,矛盾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些儿童更易成为困境儿童。张春泥也认为,家庭变迁下的子女抚育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我国,以双系抚育为基础的家庭是子女成长和接受社会化的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模式。从世界价值观调查来看,超过96%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孩子需要在一个既有爸爸也有妈妈的家庭才能幸福成长。在抚育孩子方面,调查显示,支持认可“单亲家庭能够和普通家庭做得一样好”的比例在中国内地仅为23%,在英国和美国则超过50%,日本和韩国超过40%,在丹麦、冰岛等国家则超过70%。

崔效辉特别提出,单亲家庭是多元家庭形态中的一种,是正常的、常态化的家庭形态,其出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单亲家庭的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在全国家庭中所占的比例还会上升。他认为,每一种家庭形态,在生、养、育的功能实现方面,都需要社会介入,单亲家庭也不例外。

可喜的是,近几年对单亲母亲家庭的支持在不同政策中开始有所体现。法律层面,强调“离婚后,保障负担较多家庭义务的妇女获得补偿,生活困难妇女获得经济帮助,无过错妇女依法获得损害赔偿”等。

崔效辉说,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服务,传达政府和群团组织对独抚母亲群体的关怀和爱,让

她们和社会建立起有效的连接。

结合“一个母亲”7年来为单亲妈妈群体开展心理支持服务的实践经验,刘蕾发现,通过专业支持,能缓解独抚母亲的困境,发挥她们的优势,激发其潜能。“独抚母亲不是每个人都都需要支持,不是一直需要支持,而是在最困难的阶段需要有效支持,重新站起来。因此,我们在提供支持的同时促进她们自我成长,将困境转化为改变的契机。”

呼吁给予独抚母亲更大支持

尽管如此,这一群体仍需要全方位的支持,以构建独抚母亲的友好生存环境。

在政策层面,崔效辉提出,“国内在就业、教育、健康、医疗、社会救助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政策中,还缺乏针对单亲家庭的专门性社会政策。因此,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单亲家庭,尤其是独抚母亲家庭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建设。”他建议,政府给予单亲母亲就业财政补贴社会保险,民政部门、群团组织等通过资助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社会组织为单亲家庭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一个母亲”负责人江丽也表示,相关部门应制定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的扶持政策,比如在就业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创业基金、低息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或者在同等条件下给予政策倾斜。

在法律层面,几位专家认为,可进一步优化民法典中相关条款和细则,调整抚养费标准,强制抚养费落实,如将抚养费与个人信用挂钩,从个人的工资收入中直接抵扣等,保证抚养费能落实到位,明确家务劳动价值和补偿,保障单亲母亲的就业权等。

在社会支持层面,建议建立独抚母亲档案库,方便社会工作者介入;改善社会对单亲母亲的负面评价,消除歧视和偏见,增加包容性;学校友好接纳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收集信息时注意保护家庭隐私等。同时,民政部应在办理离婚手续时,为父母双方开展相关课程,将离婚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谈到加强对单亲家庭的系统性研究,张春泥认为,要让单亲群体被更多人看见,特别是“被政府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看见,这样才能有更多针对这一人群的研究,有更多支持性政策出台。”

据了解,目前学界对单亲母亲的研究非常少,且集中在以单亲母亲为弱势群体的救助型研究上,需综合考虑经济、职业、抚养、心理和婚恋等方面。张春泥表示:“首先,目前关于国内各种类型单亲家庭规模和基本的社会、人口特征研究和数据都还太少。其次,社会大众不要给这个群体贴标签,单亲家庭是非常多元化的群体,有些单亲妈妈培养了非常优秀的子女,绝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孩子最终都能成长为性格健全、身心健康、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有些独抚母亲,甚至可以成为所有女性学习的榜样,这些是需要被看见的。”

张春泥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她们和社会建立起有效的连接。

结合“一个母亲”7年来为单亲妈妈群体开展心理支持服务的实践经验,刘蕾发现,通过专业支持,能缓解独抚母亲的困境,发挥她们的优势,激发其潜能。“独抚母亲不是每个人都都需要支持,不是一直需要支持,而是在最困难的阶段需要有效支持,重新站起来。因此,我们在提供支持的同时促进她们自我成长,将困境转化为改变的契机。”

呼吁给予独抚母亲更大支持

尽管如此,这一群体仍需要全方位的支持,以构建独抚母亲的友好生存环境。

在政策层面,崔效辉提出,“国内在就业、教育、健康、医疗、社会救助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政策中,还缺乏针对单亲家庭的专门性社会政策。因此,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单亲家庭,尤其是独抚母亲家庭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建设。”他建议,政府给予单亲母亲就业财政补贴社会保险,民政部门、群团组织等通过资助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社会组织为单亲家庭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一个母亲”负责人江丽也表示,相关部门应制定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的扶持政策,比如在就业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创业基金、低息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或者在同等条件下给予政策倾斜。

在法律层面,几位专家认为,可进一步优化民法典中相关条款和细则,调整抚养费标准,强制抚养费落实,如将抚养费与个人信用挂钩,从个人的工资收入中直接抵扣等,保证抚养费能落实到位,明确家务劳动价值和补偿,保障单亲母亲的就业权等。

在社会支持层面,建议建立独抚母亲档案库,方便社会工作者介入;改善社会对单亲母亲的负面评价,消除歧视和偏见,增加包容性;学校友好接纳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收集信息时注意保护家庭隐私等。同时,民政部应在办理离婚手续时,为父母双方开展相关课程,将离婚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谈到加强对单亲家庭的系统性研究,张春泥认为,要让单亲群体被更多人看见,特别是“被政府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看见,这样才能有更多针对这一人群的研究,有更多支持性政策出台。”

据了解,目前学界对单亲母亲的研究非常少,且集中在以单亲母亲为弱势群体的救助型研究上,需综合考虑经济、职业、抚养、心理和婚恋等方面。张春泥表示:“首先,目前关于国内各种类型单亲家庭规模和基本的社会、人口特征研究和数据都还太少。其次,社会大众不要给这个群体贴标签,单亲家庭是非常多元化的群体,有些单亲妈妈培养了非常优秀的子女,绝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孩子最终都能成长为性格健全、身心健康、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有些独抚母亲,甚至可以成为所有女性学习的榜样,这些是需要被看见的。”

张春泥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张春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普惠性或专项性政策为单亲家庭提供多种救助和育儿支持,包括照顾工作的支持,各种帮助单亲人士更好地协调工作和育儿冲突的家庭友好政策等。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体系越完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差距就越小。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加强家庭领域建设

系列专家谈⑦

史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群众在医疗、托育、养老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对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老年人规模不断增加的中国而言,如何积极构建完备、有效、可持续的制度体系,减轻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降低家庭老年人照料负担,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健康老龄化的框架下,通过事前干预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减少老年人失能风险,比事后干预更加有效且成本更低。因此,通过发展医养结合事业提高健康养老服务水平,是新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我国明确提出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政策发展方向已近十年,医养结合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建立,服务机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居家上门服务能力有所改善,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基本形成。但我国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提升仍存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可持续的工作机制有待完善。目前医养结合机构的设置审批、补助政策、服务价格等政策涉及卫生健康、民政、发改等多部门,现有扶持政策多数仅限于部门和行业内部,统筹利用不够充分。

第二,“养办医”的供需矛盾有待解决。一方面,供给总量不足。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比例不足,纳入医保定点的机构比例不高,护理型床位数量较少,难以有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养结合需求。另一方面,供需匹配不足。急需的长期照护、短期托养等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多导致床位闲置浪费,城市和农村日间照料中心闲置率较高。

第三,“医办养”的服务标准有待完善。目前医养结合政策标准仍然有待完善,特别是“医办养”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评价、服务监管等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公立医院开展养老服务收费政策、医院评审标准需要调整完善;大部分医疗机构运营管理养老机构缺乏经验,工作质量还需规范提升。

第四,长护险政策有待推广。目前,国家仅试点了职工长护险制度,但也存在一定困难和问题。一是保险覆盖范围主要以职工为主,各地政策内容和标准不统一。职工长护险目前仍处于各地探索阶段,报销比例、准入门槛、缴费机制尚不成熟。二是保险覆盖人群实际受益比例低,平均报销比例不足,群众享受服务和养老服务的支付边界有待明晰。三是存在部分地区对失能老人的评定标准过高过严的情况,部分确有需要的老人没能及时享受到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第五,职称职业发展通道有待打通。养老机构普遍存在养老服务人才稀缺且流失率高的问题。据初步统计,多数医养结合机构从业人员缺口较大,护理人员以中老年低学历群体为主。

基于上述问题,我国应构建多元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坚持“补短板”的城乡均衡发展思路,推动多层次多元化的长期照护体系建设。

第一,构建医养结合多元服务体系。推进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展老年医疗服务的居家养老医养结合发展,依托现有的医疗机构建设和发展医养养老。鼓励发展与基本医保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满足老年人的健康保障需求。推进以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探索和智能终端为主的“互联网+”养老医疗服务发展,从而形成可复制、能推广的典型经验。

第二,促进医养结合服务规范发展。一是进一步完善医养结合服务标准,严格把关。二是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完善医养结合机构可纳入医保定点的相关要求。三是研究制定医养结合机构管理办法,探索建立机构和人员的诚信档案系统,规范医养结合机构的分类管理。四是研究建立评价体系,有效监管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运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公共资金使用情况。

第三,逐步完善医养结合支付体系。一是尽快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面向特殊困难群体护理救助制度。二是进一步细化当地政府对医养结合机构的扶持政策,并建立监督机制,确保医养结合机构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扶持政策。三是整合用于社区的预防保健经费、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医疗机构和家庭病床的老年人医疗项目经费和养老机构建设运营补贴等,形成统一的支付体系,对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机构、老年病医院等给予整体的资金支持。四是利用已有的医疗卫生系统的大数据,进行全国老年人医疗卫生费用的使用情况分析,为长护险制度的建立做基础的测算研究,并结合老年健康档案建立完整的需求评估机制,合理控制老年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和照护服务的成本。

第四,重视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一是在现有健康数据的基础上,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的覆盖全民的健康云,整合老年人个人健康数据,推动个人健康信息资源共享。二是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地方探索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需求评估工作,以老年健康档案为基础,制定符合国情的老年健康分类标准及不同等级的护理标准与规范,逐步建立完整、连续性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

第五,完善医养结合职业发展机制。在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院校设立老年医学、老年护理学、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工作、老年营养学、康复治疗等专业,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和医养结合服务领域培养紧缺人才。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完善薪酬、职称评定等激励机制,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建立以老年护理为主的职业培训和考核机制,定期培训医疗卫生护理人员,培养知识结构综合、护理能力全面的一线工作者。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推动医养结合事业发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生活观察

“数字游民”:一根网线走天下

近几年,远程办公成为不少公司的新工作方式,这让“数字游民”这群隐身于人群中的自由工作者显形。“数字游民”的移动办公形式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工作与工作地点、时间的强关联,模糊了工作、生活、休闲之间的界限,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工作空间和时间的自由。当然,如同硬币的两面,“数字游民”这种全新生活方式,真的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美好吗?

边工作,边旅居

近年来,在云南丽江、大理等城市,生活着一群聚集在当地共享办公室或咖啡厅里工作的年轻人。这群人就是“数字游民”,他们选择离开大城市,去生活成本更低、环境更适宜的小城居住,成为边工作边旅居的数字时代弄潮儿。

“数字游民”直译自英文“Digital Nomad”,Nomad本意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日立公司原CEO牧本武雄在其1997年出

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数字游民”概念。他大胆预测:未来的人类社会,高速的无线网络和强大的移动设备会打破职业和地理区域之间的界限,成千上万的人会拥抱一种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的同时周游世界的全新生活方式。他还预测,这些人通过互联网赚取世界第一水平的收入,却选择生活在那些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物价水平的地方,“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彻底脱离了朝九晚五、办公室隔断和令人烦恼的通勤”。

2022年初,马蜂窝发布的《2021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显示,超六成中国年轻人渴望选择办公地点不固定的工作方式,在工作时享受度假生活。云南大理、浙江安吉等地成为当下中国“数字游民”的优选目的地、聚居地。

技术加持,观念转变

“数字游民”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实现,直接

得益于科技进步和数字技术发展。据了解,“数字游民”的工作范围广泛,包括信息技术、创意设计、教育培训、咨询、营销公关、财务会计等。这些专业的共同点就是可以使用数字工具和互联网远程执行任务。此外,“数字游民”群体人数的增长与社会价值观、求职观的转变息息相关。受疫情及经济因素影响,“逃离”一线城市的风潮再次兴起。住在成本低的地方,为付出高薪的客户服务,利用“地理套利”,花更少的时间养活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理想的工作生活方式,也逐渐获得家庭与社会的认可。

根据中国智库未来工作研究院的报告,目前,全球超过34%的员工长期处于远程办公状态。“数字游民”数量在我国快速增长,还蕴含着人们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反思。事实上,更在意生活质量、希望掌握工作主动权、对更加自由、灵活、多元就业方式的追求,已成为国人自

我价值实现、生活质量提升的优先选项。

“数字游民”并非世外桃源

“数字游民”可以让人暂时远离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职场竞争文化和无效社交带来的压迫感,避开高房价高消费、通勤时间长、内卷等压力。但同时,“数字游民”不仅仅是自由职业和远程办公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数字游民”,虽然看上去极其自由,但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与更强的能力。如何平衡自由的游玩与高效的工作产出之间的关系,需要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与自律性;从团队协作到单兵作战,必须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如何学会打破自我界限,拥有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在缺乏归属感的同时能够排解孤独感等,都是必修课。

(新华社发)